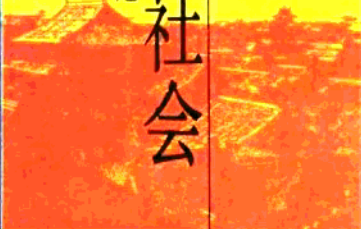


西方文化

宝成关/著

与中国社会

——西学东渐史论



西方文化

宝成关/著



——西学东渐史论—— 与中国社会

吉林教育
出版社

(吉)新登字 02 号

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 宝成关 著

责任编辑:房海滨 封面设计:曲 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2 插页 428 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印数:1—700 册 定价:15.00 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2463-1/K·72

前 言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即学术界习称的“西学东渐”，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历史上大的中外文化交流只有两次，一次是公元1~8世纪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的传入，第二次就是16世纪末开始的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两次大的异质文化的传入，都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比较起来，影响更广泛更深刻的还是第二次，而且它的历程实际上至今尚未结束。这是因为“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最新成就传入中国，并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70余年光辉灿烂而又坎坷曲折的历程之后，现在我们仍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大报告语）问题；而且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还存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继续学习、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以便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这从文化运动的轨迹来说，实质上是第二次中外文化大交流历史进程的继续，并且是在更为深广的基础上，在更为自觉的思想指导下的继续，其最终结果，必将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并反转过来对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因此，从16世纪末，或者更确切的说，从1583年利玛窦来华开始的西学东渐，至今400余年间，实际上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83~1919年，这300余年的文化交流，是以资产阶级“新学”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从1919年至今，则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这两大阶段之间，前者是后者的先导或准备，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和继续，并且是在更高水平上的继续，即通过

对“西学”优秀成果的真正吸收消化，进而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再创建出中国新文化的继续。

返观这两大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其间都经历了曲折反复的历程，而后一阶段的曲折反复，特别是建国后40余年所经历的从封闭到开放的艰难转折，除特殊国际环境和其他原因外，无一不是受传统惰力的困扰使然，而且这些都可以从前一阶段的文化冲突中找到它的潜影。因此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揭示其运行轨迹，探索其发展规律，这不论对文化理论的建树，还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都是极具价值和意义的。

正是从上述以古鉴今、以今质古的宗旨出发，拙作对1583～1919年间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撰述上严格按其历史演进与逻辑发展，着重考察：一、每个时期究竟输入了哪些西方文化？二、中国从中摄取了什么？产生了哪些影响？三、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怎样，发生了哪些冲突？又怎样逐渐融合起来的？四、当时的文化政策或朝野文化观念对西学输入有哪些影响，其利弊得失如何？在以上四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大体揭示出300余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摸索出其间的发展规律，以利于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促进现代化建设。

中西300余年的文化交流，其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但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重点。为着撰述方便，笔者对每一阶段都抓住重点，兼及一般，尽量避免以偏代全。另外，中西文化交流是个双向交流过程，其中既有西学东渐，又有中学西渐或东学西渐，而且后者的规模与影响决不逊于前者。但为节省篇幅和叙述的集中，拙作对后一过程仅在有关章节简略提及，未加展开，对此，尚祈读者见谅。

西学东渐这一研究课题，即便从狭义文化概念入手，也涉及中西古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非博通古今，学贯中

西，难以担此重任。笔者所以不揣谫陋，率尔操觚，实乃为教学逼迫所致。盖因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其中涉及西学之处，每每苦于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薄弱，尚无此类专著而难以满足学子们的求知欲望。出于教师的职责，遂开始研究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当决定着手写作时，发现目前学术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将中西文化交流分为明清之际与中国近代两大部分，这种前后断裂的做法，使人难窥全貌，弊端颇多，于是萌生出从近代上溯至明末，从其最初发轫写起，将其前后贯通起来的想法。然而真的动起笔来，又谈何容易！况且公开刊行，更需慎之又慎。为征求意见计，遂将一些观点以论文形式，先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并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提出讨论。令人欣慰的是，前辈学者和同行专家，不以鄙陋相讥，反多勉励有加。尤其是去年10月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评议笔者向大会提交的《论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一文时（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在充分肯定拙文的研究方向与学术价值之后，还特别鼓励笔者，照此路子尽早写出专著来。受此鼓舞，会后从11月起便集中精力，闭门著述，一鼓作气写了下来，值此整整一年时间，刚好煞青。

回头来看，拙作的结论或观点可能纰漏颇多，但稍感自慰的是，拙作对明末以来300余年西学东渐的历史总算作了初步的爬梳清理，并尽最大努力挖掘整理一些新的资料，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一年的光阴毕竟没有虚掷。当然，其价值究竟如何，尚待海内外博雅君子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有以教我。不过作为抛砖引玉，笔者真诚期望有更优秀的同类著作问世，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推进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著者

1992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利玛窦来华与西学东渐的发轫.....	(1)
一、利玛窦来华的前前后后.....	(1)
(一) 耶稣会：“听凭教皇任意使用的手杖”.....	(1)
(二) 屢叩难开的中国大门.....	(5)
(三) 利玛窦的“合儒”、“补儒”和“超儒”.....	(11)
(四) 利氏后继者对知识传教法的继承.....	(24)
二、以“天学”为主的多学科输入.....	(27)
(一) 天文学.....	(27)
(二) 数学.....	(32)
(三) 地理学.....	(34)
(四) 物理学.....	(36)
(五) 医学.....	(40)
(六) 神学哲学.....	(42)
(七) 其他.....	(47)
三、明末西学输入的历史评价.....	(51)
(一) 明末输入西学的性质.....	(51)
(二) 明末西学输入成就.....	(57)
(三) 明末西学输入的影响.....	(63)
四、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冲突：南京教案.....	(75)
(一) 冲突的起因.....	(75)
(二) 南京教案的始末.....	(79)



C

176895

(三) 包罗万象的文化冲突·····	(85)
第二章 清初顺康时期西学东渐的继续·····	(105)
一、顺治对汤若望的礼遇和优宠·····	(105)
二、康熙对西学的引进与限制·····	(111)
三、清初西方文化输入的深入与局限·····	(119)
四、中西文化冲突在清初的加剧·····	(137)
(一) 历法之争·····	(137)
(二) 礼仪之争·····	(151)
第三章 雍正禁教与清中叶西学东渐的断落·····	(163)
一、雍正朝禁教政策的确立·····	(163)
二、雍正驱教的原因·····	(167)
三、清中叶西学东渐的断落·····	(179)
第四章 鸦片战争:西学东渐的转折·····	(186)
一、中西关系的剧变·····	(186)
(一) “天朝”的威仪与独尊·····	(186)
(二) “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	(195)
二、域外知识的主动追求·····	(199)
(一) 鸦片战争前对西方的认识·····	(199)
(二) 战后“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	(203)
(三)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及其内在 逻辑·····	(210)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耶儒合流和“与番人并 雄”·····	(220)
一、基督教势力的东来及其在中国的文化活动·····	(220)
(一) 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渗透与泛滥·····	(220)
(二) 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	(225)
二、洪秀全的耶儒合流·····	(234)

- (一) 洪秀全耶儒合流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234)
- (二) 耶儒合流: 基督教义的中国化…… (243)
- 三、洪仁玕的“与番人并雄”方案…… (260)
- (一) 洪仁玕“与番人并雄”方案的提出…… (260)
- (二) 《资政新篇》的资本主义特色…… (263)

第六章 西方文化的第二次大输入: 从“西器”

- “西艺”到“西教”“西政”…… (272)
- 一、西方文化第二次大输入的历史原因…… (272)
- (一) 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加剧…… (272)
- (二) 封建主义的衰弱与洋务派的出现…… (274)
- 二、“西器”“西艺”的大规模引进…… (276)
- (一) 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 (276)
- (二) 近代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的引进…… (279)
- (三) 近代矿产冶炼业的创办…… (282)
- (四) 近代轻工业的兴建…… (283)
- (五) 城市公用事业近代化与近代化城市的兴起…… (285)
- (六) “西器”“西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287)
- 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输入…… (290)
- (一) 多元化的输入渠道…… (290)
- (二) 多学科的系统输入…… (293)
- (三) 洋务运动时期西学输入的特点…… (304)
- 四、“西政”的引入与早期维新派的出现…… (308)
- (一) “西政”诸书的翻译与引进…… (308)
- (二) “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与突破…… (312)
- (三) 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政教义理”的研究与介绍…… (316)
- 五、洋务派同顽固派在引进西学上的矛盾冲突…… (331)

第七章 维新派的西学输入.....	(339)
一、戊戌时期西方文化大量输入的历史条件.....	(339)
(一)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339)
(二) 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	(340)
(三) 洋务运动破产引起的历史反思.....	(341)
(四) 戊戌维新的兴起与高涨.....	(342)
二、维新派的中西会通思想.....	(345)
三、外国史志研究的深入.....	(350)
四、西方社会科学的系统输入.....	(361)
(一) 进化论.....	(361)
(二) 社会学.....	(368)
(三) 政治学.....	(372)
(四) 经济学.....	(381)
(五) 逻辑学.....	(385)
五、救亡、维新、启蒙的多重协奏.....	(391)
六、顽固派的“翼教”与“护圣”.....	(398)
第八章 辛亥时期的西学输入.....	(407)
一、西方政治学说的大规模引进与传播.....	(407)
(一) 辛亥时期译介西方政治学说热潮的形成.....	(407)
(二) 西方八大政治学说的引进.....	(409)
(三) 民主革命思想理论的形成.....	(428)
(四) 资产阶级新政治观念的滋生.....	(433)
(五) 功绩与局限.....	(437)
二、民国初年西方代议制的引进与实验.....	(440)
(一)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440)
(二) 民初国会的组成与运作.....	(449)
(三) 知识精英政治理想破产的历史反思.....	(454)

三、辛亥革命前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459)
(一)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入与泛滥·····	(459)
(二) 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463)
(三) 辛亥革命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473)
(四)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	(477)
四、国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欧化主义的校正·····	(480)
第九章 “五四”：西学东渐的界碑·····	(487)
一、人的启蒙与解放·····	(487)
(一) “五四”思想启蒙的基本内容·····	(487)
(二) 批判儒学与“输入学理”·····	(496)
(三) “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功绩与局限·····	(504)
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508)
结语：300余年西学东渐的基本规律与历史启示·····	(521)
附录 参考书目·····	(551)
后记	

第一章 利玛窦来华与 西学东渐的发轫

一、利玛窦来华的前前后后

（一）耶稣会：“听凭教皇任意使用的手杖”

1582年8月7日，利玛窦（Ricci Matteo）^①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之召抵达澳门，是为利玛窦入华传教之始。基督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唐武宗灭佛时遭禁止；至元代又恢复在中国境内的活动，而且罗马天主教也接踵而至，在北京、甘州、宁夏、镇江、泉州等地设立了教堂，但好景不长，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灭亡，从此在中国销声敛迹。利玛窦来华，使“元代以来已绝之统得以再续”，因此向为宗教史家所注重，认为“中国开教史，有明以来咸以利氏为第一”^②。而谈起利玛窦来华，又不能不提到耶稣会，以有助于了解利氏来华的动机和背景。

耶稣会，又名耶稣连队，是1540年由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正式批准成立的一个军事性宗教组织。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

① 来华外国人名在本书第一次出现时，于汉名或译名后附外文原名。

② 《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第14页，版本及出版时间见附录，下同。

nacio de Loyola), 出生于西班牙吉普斯夸省罗耀拉城贵族家庭, 原为军人, 本名唐·依纳高·鲁班, 成为圣徒之后, 又取了个罗马化的名字, 叫依纳爵。1521年在保卫藩普罗纳的战斗中, 罗耀拉右腿炸伤, 在病床消磨期间, 他读了《耶稣传》和《圣徒列传》, “耶稣受难和殉教者的痛苦形象”, 在这位“几乎未受过教育”而又“放荡不羁, 极爱虚荣”的残废士兵的头脑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 并终于将其全部热情和精力引上了“传教”和“卫道的方向”。^① 在1530~1534年间, 罗耀拉写成《神操》一书, 并网罗一批志同道合的西班牙贵族, 仿效军队的形式, 于1534年圣母升天节那天在巴黎蒙特马特圣母教堂成立了耶稣会。

耶稣会诞生之时, 正值欧洲宗教改革风起云涌。这场运动于16世纪上半叶首先兴起于德国, 继而发展到瑞士、英、法、尼德兰等西欧各国, 起因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按封建制度的尺度剪裁的天主教世界观不能再满足这个新的阶级及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了。但是, 这个新的阶级仍然长期受到万能的神学的束缚。”因此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在理论方面便表现为, “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②。

宗教改革运动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势力, 教皇的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 连其最严厉的命令, 包括革除教籍的惩处, 不仅对西欧普通教民, 就是对这些国家的王公贵族,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此形势下成立的耶稣会, 以反对宗教改革, 重振罗马教会, 重树教皇的绝对权威为宗旨。按照耶稣会的理论, 教皇位于

① 埃德·帕里斯:《耶稣会秘史》, 第15页。

②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第545~546页。

一切世俗君主之上，教皇是牧人，世俗君主只不过是牧人的狗。至于教会，更是绝对置于教皇的控制之下，必须完全听从教皇的指挥。为此《耶稣会章程》规定：耶稣会士要“永远毫不迟疑、奋不顾身地听从现在和将来的教皇对我们发布的命令”。章程还明确要求，每一会士应勉励自己，完全顺服“天主通过他们的长上实行的统治，听从长上的指挥，如同自己是一具死尸那样，可以任意摆布，或者如同老人的手杖，服事掌握它的主人，听凭主人任意使用”^①。

正当教皇在席卷西欧各国的宗教改革浪潮的打击下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之际，一个不问教会动机与行为，甘愿无条件充当驯服工具的组织诞生了。当教皇保罗二世读完罗耀拉呈送的耶稣会组织草案要点时，禁不住喜形于色，高声叫道：“此乃上帝的意旨！”^②随即正式予以批准，以便利用耶稣会的活动来恢复罗马教会的势力。

为了建立耶稣会组织，罗耀拉在罗马设立了训练耶稣会士的中心，专门挑选十四五岁的少年，进行长达17~19年的宗教灌输，以培养所谓“基督英才”，保证其宗旨的贯彻实施。

在活动方针上，耶稣会强调“以特殊的方式为上帝服务”^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从事特务、暗杀等阴谋活动。为此，耶稣会士可不穿僧衣，也不必住在修道院里，而要深入社会各阶层，甚至渗入到各国宫廷和上流社会，通过充当上层教徒的认罪神甫来施加影响，扩大罗马教会的势力。此外，他们还特别注意办学校，掌握知识分子，尤其致力于争取上层人物的子女，以便

① 谢尔顿：《基督教会史》，第3卷，第413页。

② 帕斯托：《中世纪末叶教皇史》，第5卷，第395页。

③ 赫斯特费尔德：《改革危机》，第67页。

为将来取得政治影响。

为了扩大罗马教皇的势力，实现让全世界都服从罗马教廷这一神权政治理想，耶稣会除在欧洲地区扩张外，还致力于外方传教。在西方，他们把目标投向了美洲，在东方，则指向印度、日本和中国。幅员辽阔的中国，尤其成为耶稣会士朝思暮想的圣地。耶稣会被罗马教皇批准正式成立后，罗耀拉即派其亲信与密友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cois de）到东方主持传教工作。到1556年罗耀拉死时，耶稣会已在印度建立了6所学校，5个会所；在摩洛哥群岛建有多所传教点，在日本则有4个固定的会所。^①

耶稣会图谋向东方发展的活动，得到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与鼎力赞助。西班牙国王非理伯第二在1579～1581年间，就曾宣称，“将中国的传教事业列于本朝主要政事之中，与继任葡王一事等样重要”^②。一些传教士向西班牙国王鼓吹“用武力使中国基督教化”，建言：“陛下享有占据中国的名义和权利，所以有权派遣一支足以击破中国一切力量的军队到中国去，……迫使中国皇帝及巡抚大臣准予宣传福音，保护教士的安全。并饬令人民贡出所有的一切，以武力夺取企图抗拒者的财宝”^③。一语暴露了这些传教士以传教为名，企图征服和掠夺中国人民的野心。于是耶稣会的传教事业便与西方殖民事业一致起来，融为一体，他们“实心合作”，把宗教的征服与物质的掠夺结合起来，共同为开启中国的大门而携起手来。

① 裴化行著、萧澹华译：《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第106页。

② Corclier, Histoire, P167～175. 转引自：《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第169～170页。

③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00～101页。

（二）屢叩难开的中国大门

方济各·沙勿略被罗耀拉指定前往东方传教后，中国便成为沙勿略及其密友经常提到的话题。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及许多神话式的事迹，诸如瓷器是用海蚌的甲壳再和以卵壳，在地下酝酿80~100年的功夫后才能制成等等传说，深深地吸引着沙勿略，激励他决心到中国这一神秘国度里去。^①

沙勿略1541年4月从葡萄牙起程，次年5月抵达印度果阿，1549年到达日本，想从日本国王那里取得去中国的护照，但未能成功^②，不得不于1551年再回果阿。此时，沙勿略曾致书友人，谈其日本之行的感受：

在日本，我曾见中国人，他们白面亦如日人，有求知之热愿；他们明悟之透澈广博胜过日本人。中国土地肥饶，在许多出产中，丝为主要之出品。国中多大都城市，凡高厅大厦，均用石建成者。中国人对我言，彼国中有许多不同之民族，殊异于宗教；依我所闻所想，在中国有犹太人及回教人，恐未尝无教友焉。

接着他满怀希望地写道：

我期望本年（1552年）可到中国，福音在中国一经播种，必有丰富之收获，若中国人真心归化，日本人抛弃自中国传去之异说，自不难也。……我有大希望天主洞开中国之门户，不特使吾耶稣会进入，且又令别种修会前往，俾中国成为一众传教士传教之公地，而引导众人得救灵魂也。^③

① 《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第61~62页。

②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62~63页。

③ Cros, Saint Francois de Xavier, I P193~104. 转引自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65~166页。

1552年4月，沙勿略以急切的心情离开果阿，动身前往中国，但行至离广州不远的台山县所属上川岛，因中国的海禁而无法继续前进。

谈起海禁，早在明初，朱元璋便为防止倭寇与张士诚、方国珍勾结而多次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敢有私下诸番五市者，必置之重法”^①。到16世纪中叶的正德、嘉靖年间，随着“倭寇大炽”，佛郎机（葡萄牙）、吕宋（西班牙）海盗商人陆续东来，明朝的这项禁海政策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下令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甚至“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②。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虽已允许私商出海贸易，部分开放海禁，但仍采取“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③，其开放程度极为有限。如对“日本例不得往”，对“贩东西二洋之商人”，则“严其往来之程度，定其贸易之货物”，施以种种限制，尤其“禁番夷之留止”，更绝不含糊，断不许外人上岸居住。加之沙勿略来华之际，恰逢中葡刚刚在福建、浙江地区发生几次武装冲突，明朝政府更严禁葡萄牙人进入广州城。

在此背景下，沙勿略自知“入中国海岸一事，此事甚难甚危”，不得不在葡人私自占用的上川岛上驻扎下来，寻机进入广州。

沙勿略在上川岛整整呆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多方设法进入广州，都遭失败。例如他曾用胡椒和金钱打动来上川岛贸易的中国商人，将其偷偷带入广州。但中国商人认为此事“对于他们的生命财产是一种极大的冒险”，都“爽约不来”。他还计划去暹罗，利用其每三年到北京朝贡的机会，随公使进入中国，也同样

① 《洪武实录》第139、231卷。

② 《嘉靖实录》第38卷。

③ 《明经世文编》第400卷。